

12月21日,冬至的前一天,我远在英国出差。突然接到父亲吴承惠(秦绿枝)病故的消息,我一时四顾惘然,感觉是那么孤独无助。尽管父亲今年6月突发脑梗,但在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抢救下,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在重症监护室的半年时间里,得到了尽心治疗,精心护理,让我们心存希望。我们都期待他能创造奇迹。但他还是说走就走了。

至亲故去后,令家人魂牵梦萦的,无非两桩:一则是遗憾。譬如,他一直希望我能成为一位如傅雷、许渊冲这般的翻译家,闲暇时找几部美国通俗小说玩票,让他打发时间;虽然我有了翻译工作者的身份,但迄今为止,我未能达成他的心愿。又譬如我希望过几年,工作不再那么



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

吴 骞

忙的时候,能够多些时间和他在一起,请他口述,将他的生平记录下来,集册成书,不为出版,只为留一个回忆。不够时间陪伴他,已然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再则是回忆。那几天来回长途飞行,日夜颠倒,我失眠之余,脑海中时时闪现父亲的各种片断:慈容笑貌,乐观勤劳,担起家庭支柱的他;一支红色毛笔,忠于编辑职守,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他;通晓古今,生平却最爱京剧和外国电影的他;精力充沛,交友广阔,到90岁还能参加聚会的他;一头银发,丰姿倜傥,曾是我同学

结束在伊宁三中的交流,返回乌鲁木齐。

在伊宁三中,最难忘的是高中生的眼神,单纯、热切、明亮、快乐。和5位研究生走进讲堂,热情的掌声青春洋溢,几百名各族学子,一大片葵花般的笑容。

伊宁三中的眼神

梁永安

同来的5位研究生与高三尖子班的59位同学面对面谈话,年轻人的对话,无拘无束,什么话题都有。当然最关心的还是近在眼前的高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考什么样的学校?大学校园生活与高中有什么差别……面向未来的期待,有些忐忑,又充满激情。伊宁三中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复旦,今年夏天来过这里,与一群高中生促膝交谈。道别

时,他们依依不舍送到校门,其中两位学生随后考入复旦,成为崭新的2019级复旦人。

在几百人的大讲堂,给学生们做讲座,讲文学与青年的成长。时代在前进,正在打开的社会新阶段,最需要的不是按部就班的模范生,而是与众不同的创新人。巨大的增长空间,释放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新需求,谁能提供新颖的原创,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面。文学给人的,正是最丰富的想象、最真挚的情感、最多元的价值,让人获得生命广阔的展开度。世间



牡丹亭 (中国画) 刘家方

吃是一种历史行为

俞 挺

写了本书,记录的是上海90年代中期以前的流行的吃食。许多业已不存,更多业已变味。写作缘由是发现网上转载的各种上海小吃介绍的错误颇多,故利用休假之时完成。其中增益有赖于各位热爱美食的朋友记忆和对网上文献的甄别。小吃三百余种,但更是对生活的回忆。

我是生于70年代的上海人,小心翼翼但认真地生活,怀疑过一些东西,但确信在上海,生活是种重要的存在,而回忆正是这种存在的证明。如今社会食物富足,我们是吃得太多,但未必吃得更好,或者说吃的幸福感未见得见增长。我同意阿兰杜卡斯的判断,“我们越少挨饿,就越意识不到吃的含义”。还有普罗斯特说的,“气味和滋味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他们依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她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大厦。”

想更多不是为了积攒财富,有时就是为了买个安全感。在宋庄,我去看一个诗人兄弟,炎热的夏天,诗人已经开始准备冬天的食物,他把南瓜切成片,晒在天井里。那一刻,让我顿觉五味杂陈。

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和诗人一样的很多很多。当初咬咬牙,欠债买下房屋,不是为了虚荣,实在是为了安顿心灵。有了房子,就有了与别人的距离感。不像在乡下的民居,所有人生活在同一平面。楼房则把城里人都“吊”起来了,如同巴别塔,有了空间距离,互相间的交流自然也就少了。难怪现代人越来越依赖微信,可以快速建成朋友圈。前两天我就在孤独的蜗居里,快速建了几个微信群,把一路失散的故友收拢来,仿佛立刻拥有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小家庭,仿佛一颗漂在他乡的孤独的心,又有了激活的可能性。

新北漂生活记

戴荣里

一处居所居在京城西北,一处居所居在京城东南,两个居所的连线,几乎穿越了大半个京城。北京是放大的村庄,命运相似的人,比邻而居。西北居所居住着不少白领或者外国人,这里生活的讲究;东南居所普通老百姓居多,买菜喜欢讨价还价,但那里的邻居,见面喜欢跟你打招呼,有些像村里的大爷大娘。我有时在西北住住,有时在东南住住,对于北京城,感受着不同的味道,遇到的人不同,有时心情也会不一样。

我来北京N年,虽然名义上已经是北京人了,但骨子里不是。就像说普通话,人家的底色是北京老梆子味,我的山东腔,依然很明显,这没有办法。尴尬的北漂,身在异乡为异客,故乡不是你的归属,京城也未必能安顿下你的灵魂。陌生的面孔会给我不安,却也在给我展示人间的滋味。

若干年前,我住在京城的宾馆里,那时我虽然已在北京工作了好几年了,但总觉得没有一点安全感。中国人买房子,我

亲,有了兄长和我,组织了家庭;又有诸多知己好友,时刻挂念,因而以他的随和豁达,人生应该是完满的结局。

前些日子,我在家反复翻看父亲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师友追梦》。虽然他一再谦虚,说自己人生太过普通,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再华丽的悼词,都不足以描述他这一生的跌宕坎坷,多姿多彩。所幸他有书文存世,让热爱他的亲朋师友,在他故去之后,睹文思人,依旧可以忆起他的音容笑貌。

父亲在文章中一再提及,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女。我们是彼此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今,我的那部分将永远逝去。在我们诀别之际,请允许我最后再对您说一次:您是我心目中最高尚的师友,最爽朗的智者,最坚韧的男人和最完美的父亲。



上海有两条紧挨着的小马路,说起来非常有趣,一条过去叫“高乃依路”,一条过去叫“莫利哀路”。高乃依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而莫利哀则是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上海滩西区最具文艺色彩的“悲剧路”和“喜剧路”。“高乃依路”如今叫皋兰路,“莫利哀路”就是现在的香山路。

皋兰路,东西走向,东起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长约278米,1914年辟筑,曾名高乃依路,1943年更名文定路,1946年改今名。皋兰路极短,复兴公园的枯枝黄叶,伸出墙外,与马路两边的参天栎连成一片,路两边是深深庭院,远处是摘星高楼,一片肃然幽静。

皋兰路上最著名的便是位于1号的张学良旧居。这是一栋西班牙式三层独立花园洋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紧邻复兴公园。整栋建筑红瓦屋顶、乳白色的外墙,白色檐下装饰设计小巧紧凑。建筑主楼面积约800平方米,底层有大厅,是当年宴客之所,会客室在二楼,有阳台。卧室在三楼,是西班牙式的套房,推开落地窗,屋外有20平方米的平台。楼前有大花园,面积约1000平方米,园中栽种香樟、雪松、紫薇、玉兰、金桂、银桂等。

张学良曾在上海短暂居住过三次。第一次到上海是1933年3月,张学良准备出洋考察,从北京来沪,宋子文为他安排住在延安中路181号。第二次是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到沪后住在香山路2号。之后,张学良的侍卫官为他物色了皋兰路1号的花园洋房,长租了下来。到1935年的12月中旬,张学良第三次来上海后,便住在此处。赵一荻,也就是后人俗称的赵四小姐也从北京南下来此相伴。据说此后,即便张学良离开上海,赵四小姐也常来此小住。由此,坊间也把此处称为“苑苑”。

当年16岁的赵一荻与27岁的翩翩少帅,一舞定情。这段有着小爱景观,随笔温柔,史诗魂魄的半生情缘,开头竟是赵一荻的父亲赵庆华因爱女私奔在报上发表的一纸冷酷声明:“四女绮霞,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

薄暮中漫步皋兰路,灯火阑珊,让人顿时想到“地老天荒不了情”的句子,是悲,是喜,只是隐入了历史的少帅与赵四小姐才能体会,这人的天性与爱的神性中插入的世俗味道。

高乃依路上不了情



阅读街区

生活,都是维吾尔族。他们正在吃午饭,特别简单,馕饼泡奶茶。看我经过,热情招呼邀请我和他们一块儿吃。虽然刚刚吃过饭,还是坐下来和他们喝一碗热奶茶。奶茶冒着香气,微咸透着甜。看我一大碗全喝干,他们都满意地看着,黑红的脸上,漾出古老的笑容。

2019年12月27日,金高公交职工话剧社的第二部舞台剧《公交一家人》在浦东图书馆报告厅演出。这是话剧社的第二部剧,也是我第一次做编剧。社员们想在新中国七十华诞时送上礼物,一份不仅有歌颂更有对未来思考的礼物。

据说2019年度的热词是“我太难了”。确实。剧本太难了,所有跟普通百姓有关的话题都能在公交车厢里讨论,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角度,无所谓对错,都各有其坚持;突破太难了,它像是关于公交的一种精神考据,我们希望能找到自己的语言,为一种模糊的精神塑形。我太难了,每一个话题似乎都值得思考,人们在车厢里谈菜价,聊儿女,辩论哪种骨头是大骨头,应该属于干垃圾……我想讨论一些重要的东西,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才重要。

公演在年末,正是各种年终总结扎堆的时间。提前半年开始写剧本,却又刚好是中期指标的各种调整。于是每写一段都要在心里念叨:那些被一压再压的数据指标对于公交的未来到底有多少意义?在十多年前公试先试点无人售票时就有调侃:“什么时候能无人驾驶,那叫厉害”,而今天,厉害的来了!可学过数学的我们知道“=”的意义不是真正的等同,而是代表着“有些东西不重要”。1+2=2+1,那代表顺序不重要,数值才重要。一个苹果=另一个苹果,代表数量才重要,质量不重要。公交

什么东西才重要

施政

的休息时间,他们比我还拼。做一部剧,有时就像是经历一次白手起家的创业。据说,但凡创业,就只能找到三种人跟你一起干:家人、朋友、笨蛋。这样想,我就很有底气,因为在公交我既不缺家人一样的朋友,更不缺笨得很认真的同伴。这对我很重要。

作为编剧我始终在问自己:公交,到底什么才重要?然而经历过最后的谢幕,我突然有些感悟,也许更应该问的是:城市,到底什么才重要。公交对于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确实又笨又慢。但我想,因为“笨”我们才会不间所得,认真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转圈圈;因为“慢”我们才能思考,才能跟这个城市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刻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快速的关系。

十日谈

1947年,十八岁,人生第一次,翻译家陈良廷第一次涉足翻译。



扫一扫更多精彩访谈